

这项事业的某些后果。

## (2) “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动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贸易关系的三个主要后果很值得人们注意,这里只能作简略的描述。前两个后果是罗斯比(Alfred Crosby 1972, 1986)所说的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以及“生态帝国主义”。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许多人包括罗斯比(1972, 1986)以及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和人》(1977)中都描述了这种毁灭性的扫荡。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在大陆上,病菌的传播比科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率领的远征军进展得更快更远,也更具有毁灭性。科特斯和皮萨罗发现,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他们带来的新植物种子和动物则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着它们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这些征服活动是毁灭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Crosby 1994:22)。北美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许多土著居民。关于欧洲对美国的根本影响,有一种估计是,土著居民

从500万减少到6万,后来才重新开始增多。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Livi-Bacci 1992:51)。

甚至在游牧民族的亚洲腹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罗斯比(1994:11)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不过,与新的跨大西洋接触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欧亚地区的传播没有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衰落。当然,这是由于非洲—欧亚地区的居民早已从多少世代的入侵、迁徙、长期贸易等相互接触中继承了较强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对欧洲的相对巨大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在欧亚大陆中的封闭和边缘地位。

“哥伦布基因交流”不仅涉及到人类,而且涉及到动物和植物。旧世界的欧洲人不仅把自己而且把许多新的动植物引进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动物是马(美洲原来也有马,但后来灭绝了)、牛、绵羊、鸡和蜜蜂。欧洲人带来的植物中,较重要的有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和莴苣。他们还带来了香蕉、咖啡。如果从实用角度而不是从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们带来的,而且后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的经济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哥伦布交流”,新世界也对旧世界有许多贡献,例如动物方面的火鸡以及许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大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存条件。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和生存可能性,因为它们比其他

作物更能经受恶劣的气候。新作物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绝对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可能最大,因为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两倍(Shaffer 1989:13)。中国在16世纪60年代已有关于红薯种植的记载,玉米在17世纪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Ho Ping-ti 1959:186 ff.)。马铃薯、烟草以及其他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论述到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长远比欧洲大得多。今天中国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于美洲的(Crosby 1996:5)。今天,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全世界种植的块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Crosby 1994:20)。在非洲,特别是木薯和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坚果和无处不成活的西红柿、辣椒扩大了人们的生存可能。后来非洲也成为可可、香草、花生和菠萝的一个主要出口地,而这些原本都来自美洲。

当然,哥伦布交流的第三个主要后果是新世界的金银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这也给自16世纪起旧世界经济中的经济活动和贸易一个新的推动。第3章将详细地考察这些流动,但在这一章将回顾一下这些后果对贸易流向和贸易平衡的某些影响。

### (3) 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

我们特别有必要对地区间世界贸易网的某些特点作一点初步的评述(尽管在这一总结中它们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笔墨)。这些特点涉及地区、商业移民群体、文献记载和生态等方面。

把“美洲”、“欧洲”、“中国”说成“地区”,一方面是为了说明

上的便利而武断地确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像刘易斯和威根(Lewis and Wigen 1997)在《大陆的神话》一书中所强调的,也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世界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边界”内的劳动分工以及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与“边界”外的分工和交易。“内部”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对外”贸易关系,可以归因于地理因素(高山、沙漠或海洋的分割和阻碍),政治因素(帝国的控制能力和代价以及帝国之间的竞争),文化因素(种族、宗教以及语言的联系)以及其他因素或其他的因素组合。群体的结合取决于因时因地的目标和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很突然的。地区“单位”或“群体”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小家庭或大家庭,一个村庄或城镇,一个地方性“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性”地区(环地中海地区)或一个“世界”地区(美洲、西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些“地区单位”的确定是多么不稳定和不严格(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十分严格),对它们的确定是多么武断。这也是为了强调,地区内的联系无论多么紧密,并不构成地区间的联系的障碍。实际上,所谓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本身不过是我们如何着手确定地区的一个变量。如果世界是一个“地区”,那么一切都是内部关系。同理,如果断言现在或曾经有一个世界经济或体系,那么也就等于说它是由地区构成的。一切都取决于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存在着什么样的地区。

因此,在1400—1800年这一时期,美洲、欧洲、东南亚或中国是不是“地区”,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定义。就西半球大部分“亚地区”而言,美洲内部的贸易关系肯定不如这些“亚地区”各自与欧洲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更不用说文化上的联系和接触或政治关系了。欧洲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它们各自与